



GIDE

纪德文集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

GIDE

纪德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André Gide

ROMANS

RECITS ET SOTIES

OEUVRES LYRIQUE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Editions Gallimard, 19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德文集(1—3 卷)/(法)纪德(Gide, A.)著;桂裕芳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

ISBN 7-02-003292-3

I. 纪… II. ①纪…②桂… III. 小说—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2020 号

责任编辑:傅勇强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李 博

纪德文集

Jide Wenji

[法]纪德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9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4.625 插页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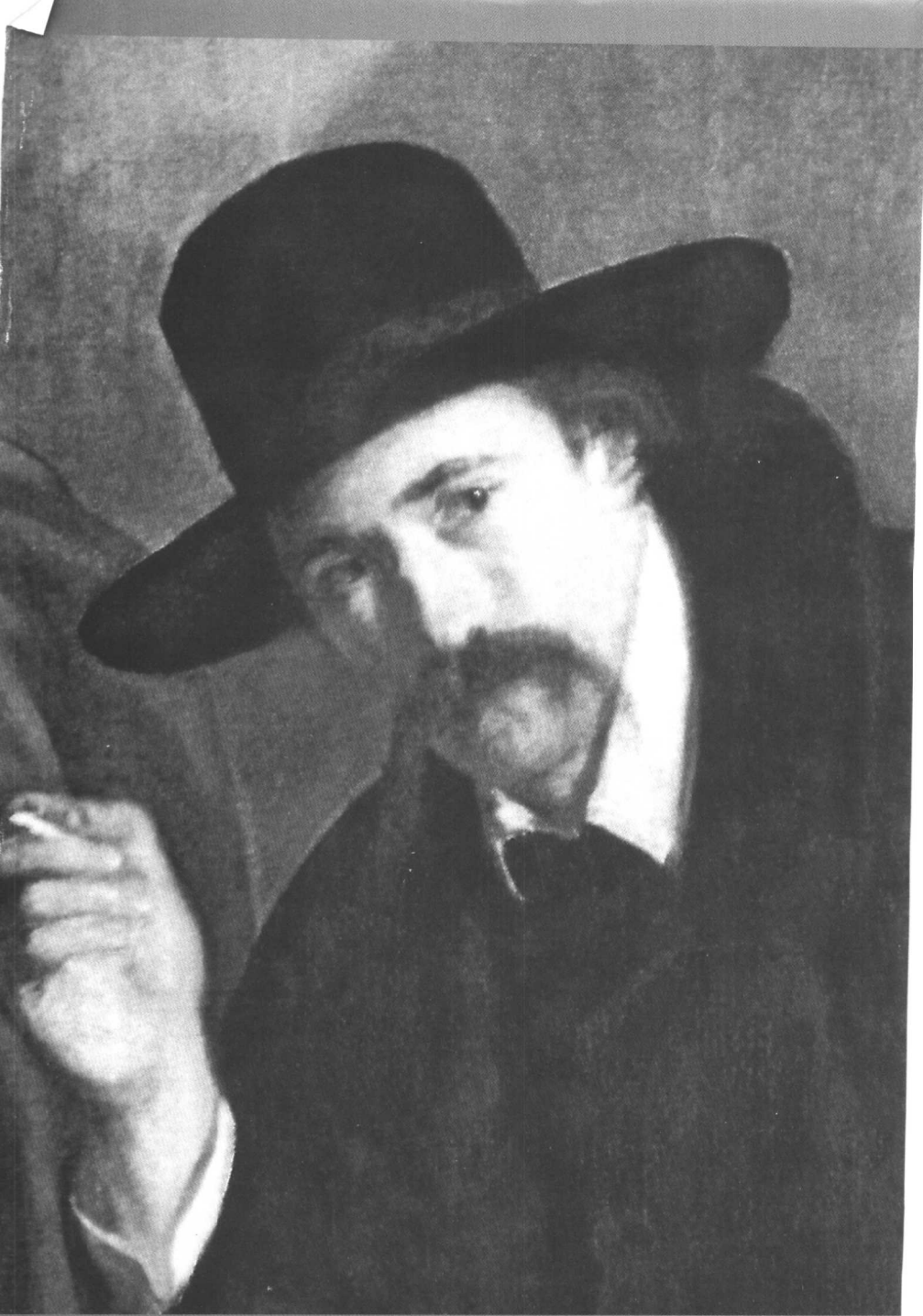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3292-3/C·29

定价:68.00 元



总 序

法国二十世纪著名文学家，一九四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去世已经半个世纪。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纪德文集》，收入纪德的大部分叙事作品，同时花城出版社也出版《纪德文集》，收入纪德的重要散文和杂文。这样，纪德的作品，除早年的诗歌和日记、通信外，基本上全部呈献给了我国读者。南北两家出版社遥相呼应，齐心协力，成就了出版界与翻译界的一桩美事。

纪德的名字，我国读者并不陌生。早在一九二八年，译界的老前辈穆木天先生就翻译出版了《窄门》，这大概是纪德的第一部汉译作品。那时候，纪德还没有获得世界性的声誉，我国的译界就已经注意到他，说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译界对西方文学跟踪紧密，感觉敏锐。以后，三十到四十年代，我国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太太学堂》(当时译作《少女的梦》、《妇人学校》、《女性的风格》等)、《大地食粮》(当时译作《地粮》)、《人间食粮续篇》(当时译作《新的粮食》)、《伪币犯》、《田园交响曲》等，都是纪德的代表作，足见纪德在我国的翻译，不但起步早，而且成就斐然。不过，后来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纪德的名字在我国一度湮没不闻，以致有人误以为纪德作品的翻译介绍是晚近的事，殊不知二十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中，他是最早便有作品译介到我国来的一

位。

纪德的文学生涯起于十九世纪末,止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个时期,恰逢欧洲文学经历深刻的转型,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汇聚成一股汹涌的潮流,欧洲各国都出现了一批以创造现代文学为己任的作家,例如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德国的恩斯特·托勒尔、意大利的马里内蒂等等,而在法国,文学改革的势头尤其显得强劲,出现了普鲁斯特的划时代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文化运动,出现了以克洛代尔和瓦雷里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此外,马尔罗、莫里亚克、季奥诺等著名作家也都以各自的方式探索文学改革之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创造现代文学的热潮中,纪德的名字分外引人瞩目,犹如一颗巨大的恒星,放射出夺目的光辉。他与同时代的普鲁斯特一道,成为二十世纪法国第一次小说革命的伟大奠基者。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即便不是销售量达数十万册、上百万册的畅销书,至少也应该深受公众欢迎,赞美之声不绝于耳才对。然而纪德的许多作品,包括《背德者》、《梵蒂冈地窖》这些代表作,初版时印数都极其有限,不少是作者自费出版,出版后又遭遇“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尴尬局面。纪德曾经喟叹作品发表后“非但没有评论,连提都没有人提”。原因何在?纪德自己认为:“包围我的沉默是我自己造成的,哪一个批评家我都没有给他赠书。”照评论界尤其报刊评论的规矩,纪德不赠书的做法不免会被看作“孤高矜矜”,作为报复,评论界和报刊回之以置若罔闻,倒也是理所当然。不过,大而言之社会,小而言之批评界,对纪德其人和他的作品颇多保留,无疑也是导致“沉默”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就连纪德的一些

朋友对他的作品也不敢恭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纪德被看作文学的“颠覆者”,更糟糕的是他还背上了道德“颠覆者”的恶名。这种双重“颠覆者”的身份一度曾使纪德很有点“声名狼藉”,有人嘲笑他的作品形式不伦不类,有人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伤风败俗,当然也有人双管齐下,从两个方面作了否定和抨击。如今,纪德伟大作家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历史已经下了结论,但是对他在小说革命方面所做的试验性探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仍旧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他对传统思想道德的叛逆和颠覆,情况更为复杂,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纪德文集》的出版,为我国读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

纪德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法学教授,叔辈中也有两三位教授,绝对是书香门第,家庭里知识氛围很浓厚。他的外祖父是经营有方的商人,去世后财产大半留给了长女,也就是纪德的母亲,这位妇女也是理财高手,因此纪德的家境一直殷实富足,靠着家庭的财产,纪德一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写作对于他纯粹是精神活动的需要,与物质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纪德的家庭还有一个特点,父亲家是南方于采斯人,母亲家是北方卢昂人;母亲是虔诚的新教徒,父亲虽然也信奉新教,但不那么刻板;父亲性格开朗,脸上常挂着笑容,母亲则总是板着面孔,“千金难买一笑”;父亲喜欢带儿子到户外活动,母亲则在一旁不时生硬地、不耐烦地催促:“天晚了,该回家了。”总而言之,无论从地域上,从性格上,某种程度上从信仰上讲,父亲和母亲是对立的,分裂的。纪德说道:“在我身上把相互矛盾的影响结合起来的两个

家庭、两个省份，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多大啊！”

纪德有时候相信对立的血统、地域、信仰在自己身上已经融为一体，他说：“在诺曼底和南方之间，我不想选择也不能选择，不过，我是法国人这种感觉因此反倒愈加强烈，因为我不属于法国某一个地方，也因为我思考问题，既不会单像诺曼底人，也不会单像南方人，既不会单像天主教徒，也不会单像新教徒，还因为我出生在巴黎，既会讲奥克语，又会讲奥伊尔语，既懂诺曼底粗笨的方言，又懂南方如歌的曼语，既好饮葡萄酒，也好饮苹果酒，既欢喜幽深的树林，也欢喜荒凉的山石，既欢喜白色的苹果花，也欢喜白色的杏花。”真是诗意盎然！似乎上帝对他格外施恩，让他结合了南方和北方的优点，融会了新旧教之长，可谓得天独厚。但有时候他就不那么乐观了，他曾经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上帝有意让我降生在两个星座、两种血统、两个省份、两种信仰之间，这难道是我的错吗？”事实上，诗意的抒情和忧郁的叹息，都道出了纪德真实的内心体验。家庭内部在思想、道德、宗教以及性格方面的分裂和对立对纪德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他身上形成了并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南方人的外向活泼，喜爱大自然，偏重感性，追求感官的享受，另一方面是北方人的内向拘谨，喜爱思考，偏重理性；一方面是天主教徒（或温和的新教徒）富有弹性的道德观，另一方面是新教徒严格的道德观。两方面都是真实的存在，都是纪德精神中的真实存在，这些彼此矛盾又彼此渗透，完全属于纪德个人的真实存在，成为纪德创作的源泉。

由于纪德的父亲在他十一岁时便去世，因而在纪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由信奉新教的母亲所代表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家庭生活中占上风，新教严格的道德信条在纪德心灵中形成

无形的束缚,使他对欲望、本能的冲动、感官的享受感到害怕。据纪德的朋友和同学回忆,学生时代的纪德是个内向、忧郁的少年,少言寡语,多少显得有些木讷,以至于一位老师误认为他是低能儿。

如果纪德永远在新教教义所规定的这条生活道路上走下去,他也许就不会成为作家,至少他的作品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但是他的生活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转折点是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四年间他与青年画家洛朗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旅行。纪德在埃及染上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和今天的艾滋病一样可怕,纪德惊恐万状,自认为“此生休矣”,不料他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仿佛获得第二次生命。死里逃生使纪德对生活产生了全新的感觉。重新看世界,好似新生的婴儿,对外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北非的阳光、沙丘、草木、民俗更强烈地刺激他的感官,激起他充分享受生活的强烈愿望。他觉得过去自己的生活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生活,太多的道德考虑束缚压制了官能的享受,从现在起他要敞开胸怀接受自然的恩赐了。总之,对于纪德,这是一次解放。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北非的生死经历对纪德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强烈冲击,改变了他的一生,但这件事毕竟只是一个导因,它不过是将原本隐藏在纪德心灵深处的本能的欲望激发起来罢了。事实上,在此之前,在纪德的心灵深处,改变生活的渴望酝酿已久。一八九三年出版的《乌连之旅》可以说是他意识这种渴望的自然流露。作品充满了瑰丽而奇谲的想象(顺便说一句,就作品讲述了乌连神奇的旅行而言,不妨把它看作一部叙事作品,然而就其强烈的抒情性而言,就其缺乏连贯的故事情节而言,把它看作抒情散文也许更恰当些。本书中的《大地食粮》、《挣脱锁

链的普罗米修斯》等作品也属于此类),富于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纪德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的一段话给我们以启发:“这本书的核心情绪并非个人的情绪,而是从我们惊奇的呱呱坠地直到不甘地死去,生活之梦所赋予我们的情绪。我笔下那些没有个性的水手或者整个人类,或者我自己。”乌连和他的朋友们的旅行,象征人类的追求,也象征每一个人的生活之梦。从风光旖旎的南方到千里冰封的极地,他们在海上的冒险中经历了种种诱惑和凶险。他们是一批“阿耳戈勇士”,虽然没有得到金羊毛的欢乐和骄傲,但是在生活之梦中体验了人生的基本价值,死的严寒也不足以使这种体验失去意义。在他们看来,这种体验是“光荣的命运”。乌连和朋友们上船之前,“不再相信研究”,“对思想感到厌倦”,他们渴望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尽管新的生活是什么,在他们心里是很朦胧的。后来,纪德把这种潜在的渴望形象化地写进了小说《背德者》。主人公米歇尔在与妻子做第二次北非旅行之前,虽然“完全不爱”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结婚是“为了让父亲高兴”),但是却对妻子很“温柔”,他工作勤奋努力,家庭生活平静而温馨。但是,我们能说他心底深处没有打破平衡的冲动吗?他不是像乌连一样,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对书本,对思想感到厌倦了吗?所谓“厌倦思想”,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否定思考,而是对原有的思想方法和理念感到厌倦,并进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以思想代替生活是否违背了人生的真谛,是否值得,生活是否应该是另一个样子。所以纪德在《大地食粮》里说,他渴望洗净双眼上“书本的污秽”,让眼睛像蓝天样纯净。

在《大地食粮》里,纪德第一次勇敢地公开表达了超越道德约束的决心。纪德描绘了自己渴望新生活的焦躁激动心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就像这满满的一杯冰水,一个发高烧的病

人手里端着满溢的一杯水，想喝极了，便一饮而尽，尽管他知道应该等一等，但他无法把这杯如此甘美的水从嘴唇边移开，这水好清凉啊，而他被高烧煎熬得焦渴难忍。”他觉得他“整个身心，似乎亟须在新生中重新接受洗礼”，而他的双眼则需要“全新的视力”。纪德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极度兴奋的心情走上了“离经叛道”之路的。这种心情，我们在《背德者》里米歇尔的经历中可以感觉到，在《伪币犯》的主要人物之一贝尔纳·普洛费当第的经历中也可以感觉到：贝尔纳离家出走时，不是为自己像鸟儿飞出笼子，从此可以自由自在生活而激动不已吗？

无论是《背德者》中的米歇尔，《伪币犯》中的贝尔纳，还是《浪子回家》中的浪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那就是都试图摆脱家庭的约束。家庭在纪德的小说里成为旧生活的代表、旧道德观念的化身，走向新生活的第一个障碍。纪德对家庭的怨恚，来源于他切身的生活体验。他母亲作为虔诚的新教徒，拿苛刻严厉的道德训诫管束他，而这种管束又与母爱相结合，因而形成难以抗拒的力量。要了解这一点，不妨读一读《浪子回家》。我们看到，浪子的母亲要求回家的浪子现身说法管教他弟弟，她告诉浪子他的小兄弟和他出走前的状况一样，不顾自己的身份与“粗人”交友，到田野里游荡。做母亲的尽管知道儿子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却忧心忡忡，预感又有一个儿子要成为浪子，因此进行干预。母亲力图维护的，是身份、体统、家业、婚姻等诸如此类的道德观念，进一步说，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安身立命的准则，是这个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她担忧的，企图阻止的，是儿子离开家庭，因为脱离有身份的家庭，就意味着对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反叛。《大地食粮》里有一个虚构的人物梅纳尔克，他有点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也有点像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他是个

“危险分子”，因为他教会青年“不光是爱自己的家庭，而且教会他们慢慢离开家庭”，所以“明白事理的人全都谴责他”。实际上，这个“危险分子”就是纪德自己。他说：“生活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所有的方式我觉得都是美好的。”但是显而易见，他偏爱的是“大地食粮”，是摆脱旧传统、旧道德的代表即家庭的束缚，按照个人意愿，遵循本能欲望去生活。对此当时有许多人表示不理解，甚至表示谴责，譬如纪德的友人，诗人弗朗西斯·雅默就不以为然地说：“我以为，在大地的生活之上，是还有神圣的生活。”

还应该指出，就纪德个人而言，这种“大地的生活”理所当然地包括性的享受。纪德很早就表现出同性恋倾向。他曾经为此深感忧虑，特地向心理医生做过咨询，医生安慰他结婚后同性恋倾向会自然消失，然而事实上却发展成愈来愈强烈的欲望。对于自己的同性恋，纪德在《梵蒂冈地窖》、《背德者》、《伪币犯》等作品里都或明或暗有所涉及，晚年在《如果种子不死》这部自传作品中更坦然加以描述。纪德在决意追求新生活之后，便恣意放纵同性恋的倾向，将之看作自然的享受而加以肯定。同性恋的是非，是生理学、医学、伦理学上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这里我们无意讨论。我们要强调的是，纪德的同性恋，特别是他将同性恋视为新生活的构成元素，这在当时被看作是骇人的丑闻，是对“优秀”社会的公然挑衅，纪德为此遭到了多方面的强烈指责。

然而，倘若以为纪德自此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背德”之路，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在上文已经介绍了他身上存在的两种对立倾向，它们造成了纪德思想和创作的复杂性。注意到这一点，就不会对他的作品呈现出的矛盾面貌感到奇怪。他早年的作品《安德烈·沃尔特手记》已经流露出了这种内心世界的矛盾，作品主人公沃尔特一方面热恋着表姐艾玛努埃尔，他的感情纯洁高

尚,完全是柏拉图式的;另一方面他又到妓女身上去寻求官能的享受和满足。正是由于这种矛盾,《伪币犯》里的贝尔纳在执著而热烈地追求新生活后,并没有预期的轻松感、幸福感、满足感、成就感,他“感到欲望满足后的一种悲哀,一种伴随着快乐而同时隐匿在这快乐后面的绝望心境。”这种心境在《背德者》中米歇尔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米歇尔将最亲密的朋友招集来,向他们诉说内心的情感,他的叙述是那样真实,以至于朋友们虽然觉得他对妻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感到“无从责备他”,甚至感到有“同谋”的嫌疑。因为,事情的复杂性在于,米歇尔既没有意识到应该对妻子的死担负什么责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突尼斯的行为是对社会道德的挑战,他仅仅是凭着本能的愿望在行动。小说结尾,米歇尔的话意味深长:“我觉得,我的生活似乎还没有开始……我解脱了,这有可能,但是这又有什么用?这种无所用心的自由令我痛苦。”《背德者》是纪德的小说里自传色彩最浓厚的一部,米歇尔的故事和纪德本人的经历有许多相近之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米歇尔的这句话说出了纪德的心声。米歇尔和贝尔纳都以有意识地与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分道扬镳而开始新的人生历程,结果都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在“这种选择是否有价值,是否就是人生真谛”这个问题上徘徊起来,何去何从,难以抉择。

他们的彷徨,原因何在?在纪德伸出双臂迎接新生活洗礼时,在他追求新的“视力”时,在他迫不及待一口气饮下“清凉甘美”的“冰水”时,他早年受家庭的新教气氛影响而形成的价值观成为了制动装置或缓冲装置,这可以从《背德者》发表后不久纪德创作的《窄门》中得到证实。在这部小说中,纪德塑造了阿莉莎这个与米歇尔迥然相异的人物形象。纪德对这两个人物

形象都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而这两个人物在性格和思想上却南辕北辙,对比鲜明:米歇尔为追求个人的新生活而将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神圣的教义、道德的规范统统抛却九霄云外,而阿莉莎则终其生恪守宗教训诫,终生怀着炽热的宗教感情,为了自己和情人热罗姆能够通过“窄门”而进入天堂,勇敢地牺牲此生的幸福,包括对热罗姆一片赤诚的爱。如果说米歇尔在病愈之后将幸福定位于此生此世,那么阿莉莎则坚决相信,人生的全部价值就在于走过通向天堂的“窄门”,她深信“一个人要是确实渴望真实而恒久的荣誉,那人世间的荣誉对他就轻如鸿毛”。《背德者》和《窄门》虽然在发表时间上有先后,但是它们都在作者头脑里孕育了很久,它们的思想色彩上的强烈反差并非作者思想变化的结果,它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作者分别强调了自己思想里的不同侧面。米歇尔享受今生,作乐于此刻固然表达了纪德的追求,阿莉莎的“窄门”情结却也同样流露了纪德心底的宗教感情。应该指出,阿莉莎的宗教感情事实上与带有博爱色彩的宗教关怀有较大距离,而且带有苦行的成分,以至有批评家认为,她的信仰与其说是新教,不如说是冉森教。这样的信仰,正是纪德内心体验的需要,而且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灵之中。他一方面渴望所谓“充实的生活”,以传统道德颠覆者自居,否定作为社会道德稳定基础的家庭,甚至肯定同性恋行为,另一方面他又总感到必须有什么东西来制衡或者平衡颠覆行为,而对平衡物的寻觅不期而然地把他带回传统,对“神圣的生活”表示肯定,对宗教对欲望的制衡作用流露出宽慰,甚至欣喜。在《伪币犯》里,一个叫格里菲斯夫人的人物批评小说的主要人物爱德华说:“你使我想起有些英国人,他们的思想愈开明,他们愈揪住道德不放,因此没有比他们中有些以思想开明自居的人更带清教徒精神的

……”虽然爱德华力求成为“开明”作家,在文学和道德上都主张新观念,但是格里菲斯夫人却从他身上看到了根深蒂固的清教徒精神,开明的思想和清教徒精神本应该是水火不容,在爱德华身上却相反相成,这是他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全部内心经验复杂性的核心。爱德华这个人物从许多方面看很像纪德本人的影子,因此,小说中的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它其实是纪德的自画像。

纪德对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的不满,受到了尼采的影响。然而纪德没有像尼采那样高呼:“上帝死了。”因为上帝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死。

三

纪德的许多作品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大地食粮》、《乌连之旅》、《浪子回家》等固然距离传统意义的小说很遥远,《帕吕德》、《梵蒂冈地窖》等也与传统意义的小说很不相同。在纪德的时代,小说模式是由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们创造并且固定下来的。这种模式的基本要求是,小说作品要有首尾一贯的情节,情节的发展要合乎读者对生活逻辑的理解,小说人物在身份、性格、思想、情感各方面的轮廓都必须清晰,他们的行为要真实可信。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龚古尔、莫泊桑、都德等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家的作品使得这种小说模式深入人心,在读者心中形成必然的阅读期待。

因此,纪德在很长时间里不把他的作品称为小说,而是称为“傻剧”(例如《帕吕德》、《挣脱锁链的普罗米修斯》)或“叙事”(例如《背德者》、《田园交响曲》)。惟一称为小说的作品是《伪币犯》。这种分类很难说有充足的理由,不过重要的问题不是纪德

有哪些具体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而是他这样称呼自己的叙事作品说明了什么。这一点,要从纪德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基本观点来理解。纪德开始小说创作时,正逢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不断扩大,法国文坛上已经出现了一批小说家,例如于斯芒斯、维里耶·德·李尔—亚当、布鲁瓦,他们反对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小说,主张小说将目光转向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由于叙事性的减弱,他们的作品都多多少少偏离了传统小说的形式。例如于斯芒斯的《逆向》讲述了主人公戴赛散特的青年的故事:一个懒散而敏感的青年,终日无所事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些近似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但是于斯芒斯的作品不是如冈察洛夫那样从生活的外在现象来展示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而是直接揭示主人公的心灵状态,作品的叙事因而明显淡化,散文化、诗化的倾向增强。此时的纪德,正在经历艰苦的精神探索,心灵深处正发生激烈冲突与碰撞,自然对这样的倾向表示认同,他以诗歌开始创作生涯,作品带有鲜明的象征主义印记。当他转向叙事作品创作时,仍然以诗化、散文化的风格见长。在叙事作品创作早期,纪德对形式革新显然并没有自觉的意识,其作品的形式是内心冲突和感情本能流露的结果。从他创作《梵蒂冈地窖》开始,形式革新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探索,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形成了成熟的小说观,这个时期创作的《伪币犯》和《〈伪币犯〉日记》就是纪德长期思索的产物,他在《伪币犯》上标以“小说”二字便表明他认为自己已经寻找到了小说的真谛。

纪德认为,小说在十九世纪被掺杂进了许多原本不属于小说的东西,所以当代小说家的任务是要清除这些杂质以纯净小说。“纯小说”于是成了纪德小说革新的口号。他在《伪币犯》中

说：“取消小说中一切不专属小说的元素。正像最近照相术已经给绘画省去一部分求正确的挂虑，无疑留声机将来一定会肃清小说中带叙述性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常是写实主义者引以为荣的。外在的事件、遇险、重伤，这一类全属于电影；小说中应该舍弃，就连人物的描写在我看也不真正属于小说。真的，我不以为‘纯小说’（而在艺术中像在别的事物中一样，我所惟一关心的是纯洁）有这需要。”被纪德归入应该清除之列的有“叙述性的对话”、事件的描写、人物描绘，要言之，是对真实（正确）的“挂虑”。换言之，他要清除的恰恰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元素。十九世纪之前的小说，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说，可以说在形式上还没有成熟，然而换角度说，却也可以说那时的小说比较灵活，比较自由，当时的读者对小说也没有后来的读者那样的阅读期待，即期望读到完整有趣的故事，接触到性格鲜明的人物。简单地说，那时的读者不期待从小说中听到“历史”。从小说的功能说，那时的小说不承担后来巴尔扎克赋予小说的那种沉重的使命，即小说要表现现实，解说现实，阐释历史的发展。所以，清除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元素，是要结束小说作为一种“历史”的历史，某种意义上是要让作者可以像十八世纪小说家那样多少有点随心所欲地表达个人的感受、感情和思想，让小说从十九世纪小说家手中的客观描绘转变为（或者说恢复为）对主观世界的观照。当然，这样说是简单化的表达。十九世纪的小说也包含对主观的观照，纪德的小说也不可能完全排斥客观描绘。但是，作为基本观念，观照主观世界，表现个人的内心经验，无疑是纪德小说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就决定了纪德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他把自己的经历、经验、感受、感情大量融入作品。像《帕吕德》、《背德